

纪念延安双拥运动八十周年

让双拥之花更加绚烂

□ 孙善康 印祺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的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80年来，双拥光荣传统历岁月沧桑而不变，经时代变革而弥坚，始终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并将一路创造新的辉煌。

双拥运动兴起

双拥运动早在大革命时期便已萌芽。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首次提出“军民一致”原则，随后将其确定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同年，边区政府颁布《抗日军人优待条例》《关于拥护和扩大八路军的决议》等文件，双拥工作由此日渐制度化、体系化。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为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开展一次“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拥护军队”的运动。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确定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25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作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同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又发出《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令》，规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全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2月1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民公约》十条，这也是人民军队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在军地双方相互推动和配合下，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拥军优属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及人民群众对当地驻军及部队中的伤病员、残疾人员、抗日军人家属普遍进行了走访慰问，送去春联、粮食等物品及部分现金，并与驻军举行多种形式的联欢活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同志，率领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第359旅的指战员。一些地方干部还进行了拥军工作的反省和自我批评。

在拥政爱民运动中，八路军留守兵团等驻陕甘宁边区部队，采取召开干部会议和军人大会的形式，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拥政爱民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尊重政府和爱护人民的意识。同时，广泛开展登记旧案工作，发现有损害政府和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予以赔偿、退还、道歉。通过举

行多种联欢活动，增进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

双拥运动极大地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使边区军民达到空前的团结，有效保障了对敌斗争与生产运动的胜利。1943年5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拥军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的经验》社论，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双拥运动的重大成绩和成功经验，号召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学习借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自此，双拥运动在各根据地逐步开展起来，并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赓续双拥传统

解放战争时期，双拥运动进一步发扬光大，展示出巨大威力。1947年10月10日，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使全军有了统一的纪律和行为规范。此后，各部队先后进行政策纪律教育，许多单位还推出遵纪爱民公约，个人制订了遵纪爱民计划，并将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列入立功运动，定期进行检查，开展表扬和批评。这些举措极大增强了干部战士的群众观念和政策纪律观念，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支援解放战争，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场面。上党战役打响后，太岳地区人民群众用实际行动响应“紧急动员青壮年参军入伍”的号召，掀起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大规模参军热潮。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支前民工就达886万人，出动担架36万余副，大小车100余万辆，牲畜200余万头，输送粮食64万吨。从抗日战争“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到解放战争“潮涌般的小推车和担架队”，双拥工作都深刻揭示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争法则。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成立，其中优抚司主管拥军优属工作。1950年12月22日，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新旧历年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之后的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全国军地主管部门都要组织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指示，全国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热情地投入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其中包括：各族人民、社会各界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写慰问信、组织各种慰问团赴朝鲜战场前线阵地慰问志愿军。各级人民政府和全社会优待军烈属。全国掀起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志愿到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担负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全国各地分批将饼干及肉、蛋、蔬菜等制成品送往前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军民团结的巨大力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为新中国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摘自2023年2月2日《中国国防报》）

《吴印咸在为毛泽东拍电影》背后的故事

□ 王建平



吴印咸在为毛泽东拍电影 马友似（摄）

这是一幅电影工作照，题目是《吴印咸在为毛泽东拍电影》。在照片中，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欢迎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背对镜头那位外国军人是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而右边头戴戴形帽的高鼻梁的军人黑影则是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左下角戴军帽挥手的八路军将领疑是开国元帅叶剑英，因为他当时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毛泽东的表情是愉快的欢笑，而包瑞德嘴角上扬，也是笑脸。这说明现场气氛轻松而友好。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迎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一件大事，不但表明美国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开始对延安的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而且也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封锁破产的标志，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国际统一战线起点的和外交工作的开端。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布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明确指出：“我们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为此，中共中央还给包瑞德授勋，由朱德夫人康克清献花。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出席授勋仪式。吴印咸等人为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拍摄了珍贵影像。

在画面里那个拿摄影机进行拍摄的人就是著名电影艺术家吴印咸。他手中的35毫米摄影机叫作“埃姆”摄影机，是世界著名的荷兰纪录片大师约里斯·伊文思赠送的。抗战爆发后，伊文思积极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他来到中国，不但拍摄了讴歌中国人民艰苦抗战

的影片《四万万人民》，而且还亲赴台儿庄战场拍摄了大量素材。可是，当他要前往延安时却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当他听到周恩来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筹备拍摄八路军电影时，便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摄影机和2000英尺胶片无偿送给八路军。于是，周恩来派左翼电影摄影师吴印咸坐自己的专车，在一个黑夜，去汉口郊外的一条偏僻马路边，与同样坐着一辆小车前来的伊文思交接摄影机和胶片。他们接头的暗号是“延安！延安！”有意思的是，在夜色里，吴印咸和伊文思没有看清对方，直到1957年，两人再次重逢于北京时才彼此相认。

1938年9月，吴印咸拿着伊文思赠送的摄影设备和其他购买到的器材，与导演袁牧之以八路军战士的身份到达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立即成立了延安电影团，由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开国大将谭政亲自兼任团长，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电影事业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电影1895年在法国诞生后，以其生动的影像而风靡世界，并且很快传到中国，成为深受欢迎、影响极大的新兴艺术和新闻报道形式。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电影方兴未艾，成为当时中国电影主潮，但是因为环境特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直接领导电影事业，直到延安电影团成立，才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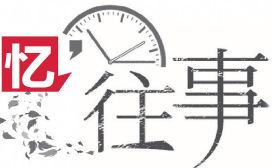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度重视传播力和影响力巨大的电影，对延安电影团给予大力支持。毛泽东在电影团成立时就亲切地接见电影团全体成员，并且在后来电影拍摄中处处给予支持，在电影团出发去敌后抗日根据地拍摄前还为袁牧之、吴印咸和徐冰饯行。周恩来就是延安电影团的发起者，他不但策划拍摄八路军电影，而且还亲自与袁牧

之和吴印咸谈话，派他们去延安。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就是根据周恩来的愿望而定的片名。周恩来每次返回延安都要过问电影团工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和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也都积极配合电影团的拍摄。彭德怀不但为电影团到前线 and 深入敌后拍摄创造条件，而且还写诗赞扬他们。后来，延安电影团虽然已经没有胶片，无法拍电影，只能拍照片，但在精兵简政中并没有被裁撤。该团负责人之一的吴印咸感慨地说：“为了要保留这批电影人才，电影团全体留下了。可见，在各级领导的心目中，这个小单位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是将来发展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

延安电影团不辜负党的期望，直接用镜头记录延安以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事件，表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风采，反映延安各行各业的风貌。在他们的镜头里，有八路军和民兵抗敌御侮的战斗，和平民主的政治，自己动手的大生产，培养栋梁的教育，救死扶伤的医疗，鼓舞斗志的宣传，讴歌时代的文艺，强身救国的体育，积极主动的外交等。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都得到延安电影团的真实反映。吴印咸说：“电影团从建立直到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始终是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的。恩来同志在武汉谈话中‘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我们工作的方针，实践中也没有偏离。”延安电影团从1938年9月成立到1946年9月结束，在8年间共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和《南泥湾》两部电影纪录片，另外还拍摄了28个专题的电影素材与资料，以及数以万计的照片。他们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实现民主的生动画卷，对宣传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抗日救亡的历史功绩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自2021年8月6日《光明日报》，原标题为《用镜头为党画像立传——延安电影团摄影图片解读》）



延安首次开展纪念党的生日活动

□ 郑学富

1938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6月14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和边区抗敌后援会，召开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商定于7月1日至7日开展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周等活动；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

7月1日，延安各界纷纷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活动。当日，八路军后方各留守兵团军政首长会议、陕西公学学生会等分别给中共中央发来贺电。

上午10时，在延安市工会举行工人大会，成立延安市各业工会总俱乐部。报告开会意义后，举行了政治测验、墙报、唱歌等项比赛。下午2时，工人宣传队整装出发，在钟楼到北城门一带宣传。

为了准备于当日晚间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提灯大会，延安各学校、各团体、各机

关、各部队早就开始向南门外公体育场会合，延安一半以上的群众都涌到这里来了。会场主席台上，高高挂着“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大会”的横幅。晚上7时，大会开幕。首先由鲁迅小学学生于龙江指挥全体人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然后由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致辞。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傍晚，参加提灯大会的游行队伍点亮提灯，整齐有序地由南门入城，顿时灯火和火炬照耀大地，从延安城墙上望去，仿佛一片星海，各种雄壮的歌声回响在城市的上空。飞机灯、炸弹灯、高射炮灯、坦克车灯、战舰灯、五星灯、宝塔灯……还有绘有我国各省地图的各类彩灯依次映入群众的眼帘。最引人注目的是抗大第五大队第五中队的“五星·斧头·镰刀”灯，灯上一面写着

“71—77”，另一面写着“1921—1938”。提灯队进城后，像火龙般爬上山去，又蜿蜒而下，经过南街、西街，转入北大街、东街而汇流到府衙门剧场去，街道两侧观众云集，歌声、口号声响彻夜空不绝。提灯游行持续一个多小时，到当夜9点15分才结束。

此后一周内每天都有庆祝活动：2日为学生日，由陕北公学负责组织发动各校学生到街头、农村开展宣传活动；3日为武装日，由保安司令部、抗大组织打靶、扔手榴弹等军事比赛，还组织了男女排球、篮球，以及男子足球等比赛；4日为妇女日，举行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5日为青年日，由青救会负责；6日为商人日，由市商会负责；7日为抗战建国日。当日上午10时，延安各界人士集中在南门外的大操场，举行了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

（摘自2022年7月7日《人民政协报》）

在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展厅，珍藏着一枚石章复制品，它的原件由肖正纲烈士在狱中亲手磨制，内容是“自珍自爱，再接再厉（厉）”。

肖正纲，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新河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华容农民运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历任新四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军需科长，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和驻重庆办事处主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肖正纲在随新四军军部北移至茂林时遇敌主力部队袭击。激战7个昼夜后，部队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肖正纲被俘入狱，被关押于江西上饶周田村集中营。入狱后，肖正纲化名为肖余生，被编入“军官大队”第4中队1区队3班。

这座由国民党军统特务设立的法西斯式集中营规模庞大，由七峰岩、周田村、茅家岭、李村和石塘等处组成，号称人间地狱。敌特分子为了让被捕的人变节不择手段，先是企图通过政治诱骗“感化”被囚者，未达目的，便强迫他们每天干苦工，并通过各种重刑、毒刑对其施以肉体上的折磨，直至将其迫害致死。

肖正纲所在的周田村是个苦工营，几百名囚犯被关在有铁丝网的高墙之内，每日进行高强度的劳作，还要遭受无休止的精神折磨。肖正纲深知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便决定筹划建立秘密党组织，积极开展党员的思想工作，带领大家站稳立场，坚持共产党人的气节。他常对大家说：“现在是短兵相接的时刻，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随时识破敌人的阴谋。”

有一次，他趁上山劳作的时候精心挑选了一块石头，亲手磨制了一枚石章赠予难友，鼓励其保持革命气节，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枚石章不仅激励狱友重拾奋战到底的决心，更是肖正纲狱中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

1941年7月，因变节分子的揭发，敌特掌握了肖正纲的真实身份，先是对他轮番劝降，而后采用木刑将他打得几度晕厥，但他始终闭口不言。8月，肖正纲被押送至被称为“狱中之狱”的茅家岭。反动派们将10种酷刑在肖正纲身上试了个遍。受尽折磨的肖正纲左眼失明、全身是伤，却依旧铁骨铮铮，将石章上的八字勉勵诠释得淋漓尽致，始终捍卫着共产党人的气节。

次年，日军沿浙赣路发起新一轮进攻，上饶集中营的囚犯被迫徒步转移至福建，肖正纲也在转移队伍中。6月17日，队伍行至崇安县赤石镇，6中队秘密党支部成功组织赤石暴动逃跑。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对没有逃跑的“顽固分子”施以血腥镇压。19日，肖正纲等多名革命志士在虎山庙被残忍杀害。

肖正纲牺牲后，他磨制的这枚石章几经辗转到了他的儿子肖克武手中。多年后，石章不幸遗失，下落不明。

1979年，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新建后开馆。专家们根据幸存者的描述，复刻还原了这枚石章，将其置于四号展厅。志士虽已陨落，但石章铭刻的“自珍自爱，再接再厉（厉）”的精神品格得以永久流传。

（摘自2022年9月18日《解放军报》）

狱中的星星之火

□ 张佳慧 郭冬明

